

李劫人“大河小说”中的巴蜀地域文化记忆



郭健平, 冯智娇*

西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四川成都 610039

摘要: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以宏大的叙事格局和细腻的笔触再现了清末至民国初期四川地区的社会变迁, 展现出深厚的巴蜀地域文化底蕴。本文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 对“大河小说”中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重大历史事件及巴蜀品格的塑造进行系统梳理, 并探讨其在地域文化传承与民族记忆建构中的价值。研究发现, 李劫人通过精细刻画巴蜀地理环境, 赋予自然景观象征意义, 使其与人物命运和社会动荡相呼应; 对民俗风情的描绘展现了传统文化在历史变迁中的延续与嬗变; 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融入, 使小说成为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文学见证; 而对人物形象的刻画, 则使作品成为巴蜀人民精神特质的生动写照。总体而言, “大河小说”不仅构建了独具地域特色的历史叙事, 也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本文有助于深化对李劫人作品的理解, 并为巴蜀文化的保护、传承及跨文化传播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关键词: 李劫人; 大河小说; 巴蜀地域文化; 历史叙事; 文化传承; 跨文化传播

DOI: 10.57237/j.cll.2025.05.001

Regional Cultural Memory of Bashu in Li Jieren's "River Novels"

Guo Jianping, Feng Zhijia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hua University, Chengdu 610039, China

Abstract: Li Jieren's "River Novels" - *Ripples Across Stagnant Water*, *Before the Storm*, *The Great Wave* - recreate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Sichuan from the late Qing to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through a grand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meticulous detail, embodying the profound cultural depth of the Bashu region. This paper adopts the method of text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natural landscapes, folk customs,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Bashu character traits in these works, and further explores their significance for regional culture transmission and national memory. The study finds that Li Jieren imbues natural scenery with symbolic meaning that resonates with characters' destinies and social upheavals; his descriptions of folk customs highlight the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amid historical change; the integration of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positions the novels as literary witness of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China; and the portrayal of the characters vividly reflects the spiritual qualities of the Bashu people. In general, the "River Novels" not only construct a historical grounded narrative with strong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but also occupy a significant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

基金项目: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文化产业研究中心“巴蜀地域文化的文学记忆与译介传播: 以李劫人的‘大河小说’英译为中心”(立项编号: WHCY2024B34);

四川省巴蜀文化国际传播研究中心: 李劫人“大河小说”的巴蜀地域文化记忆与译介传播 (立项编号: 2024YB02);

四川省认知语言学会: 巴蜀小说《死水微澜》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与接受研究 (立项编号: SCRY2024GJ02);

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巴蜀文化对外传播研究专项课题: 李劫人法国文学汉译对其巴蜀文化记忆书写的影响研究 (立项编号: SC25BS032).

*通信作者: 冯智娇, zhijiaofeng@hotmail.com

收稿日期: 2025-08-05; 接受日期: 2025-09-20; 在线出版日期: 2025-10-27

<http://www.chlanglit.com>

study deepens our understanding of Li Jieren's works and provides new perspectives for the preservation, transmission and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of Bashu culture.

Keywords: Li Jieren; *River Novels*; Bashu Regional Culture; Historical Narrative; Cultural Transmission; Cross-Cultural Dissemination

1 引言

李劫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作家，是巴蜀地域和文化的执着书写者（包中华，2016：94）[1]，其作品以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和独特的叙事风格著称。其代表作“大河小说”（即《死水微澜》（1937）《暴风雨前》（1936）《大波》（1937））以宏大的叙事格局和细腻的笔触，再现了清末民初四川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历史变迁，深刻描绘了动荡时代中的个体命运与社会变革。巴蜀地域文化除了构成作品的背景外，还在文本中占据核心位置，为其叙事增添了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文化底蕴。

长期以来，李劫人及其“大河小说”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郭沫若先生曾称李劫人为“中国的佐拉”（郭沫若，1937：5）[2]，美国汉学家司昆仑（Kristin Stapleton）称其为“中国最伟大的现代小说作家”（Stapleton，2016：49）[3]。学界对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叙事特征、历史书写及现实主义风格等方面，但对于小说中所蕴含的巴蜀地域文化的系统性研究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文本分析的方法，对“大河小说”中的自然景观、民俗风情、重大历史事件及巴蜀品格进行系统梳理，探讨其在地域文化传承与民族记忆建构中的作用，旨在揭示“大河小说”如何作为一种文化载体，记录、继承并发展巴蜀地域文化，尝试为现代文学研究及文化传承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 “大河小说”中的巴蜀地域文化

“自然条件对人和文学有重大的意义，尤其在初民时代。”（李怡，1995：2）[4]而文学创作往往深植于特定的地域文化背景之中，作家的成长环境、社会经验及文化认同都会影响其叙事视角与创作风格。作为土生土长的巴蜀作家，李劫人的“大河小说”深刻映射了四川地区的社会变迁与文化特质。对此，巴金曾称赞：“过去的成都活在他（李劫人）笔下”，“也可以说，他是成都的历史家，他的小说岂止是成都的风俗志……”（李劫人研究学会，1996：7-8）[5]该系列作品不仅以历史叙事为主线，重现清末至民国初期的社

会动荡，还通过对自然风貌、民俗传统及社会风俗的细腻描绘，构建了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空间。在这一叙事体系中，巴蜀地域文化不只是故事背景的铺陈，更成为塑造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深化主题表达的重要载体。

2.1 “大河小说”中的巴蜀自然景观

李劫人在“大河小说”中对山川地貌的描绘极具特色，既呈现出四川地区的自然美景与地域特色，又借助细腻刻画和巧妙手法将自然景观与人物命运紧密相连，丰富了作品内涵与意蕴。

在《死水微澜》中，李劫人通过细腻的笔法描绘了成都平原冬季的景象，为小说的叙事构建了一个具体而生动的背景，同时也为作品的情感氛围奠定了基础。

例如，他写道：“田野间，小春既未长出，是冬水田哩，便蓄着水，从远望去，除了干干净净的空地外，便是一方块一方块，反映着天光，好像陂塘似的水田。不过常绿树是很多的，每个村庄都是被常绿树与各种竹子簇拥着，隔不多远便是一丛。”（李劫人，2017：249）[6]这一描写呈现出了一幅恬静、悠远的冬日画卷，反映了四川平原的宁静与平和。然而，这种美丽的景象不仅仅是自然的写照，它还与小说的主题密切相关，构成了人物内心世界的一种映射。冬水田的“闪烁”暗示了人们在沉寂中的希望与隐秘的生机，然而这种光芒又是短暂的、微弱的，恰如小说中人物在动荡社会背景下对理想与未来的渴望。

接下来的描写则为这种自然景象注入了更多的沉重与压抑感：

“成都平原的冬天，是顶不好的时候，天哩，常是被一派灰白色的厚云，从早至晚，从今天至明天，老是一个样；有点冷风，不算很大，万没有将这淡的云雾略为揭开的力量。”（李劫人，2017：249）[6]

李劫人通过对天气特征的刻画，营造了一种压抑、单调的氛围。灰白色的厚云象征着笼罩在成都平原上的沉重气息，也暗示了小说中社会动荡与人们无法摆

脱的命运困境。寒冷的风和无法撕开云幕的无力感让人感受到一种无望的局限，反映了人物在困境中的无力感与对未来的迷茫。

这段自然景观的描写为故事提供了物理空间的舞台，更在情感层面加深了小说的象征意义。李劫人通过对景象的细致刻画，将自然环境与人物的内心情感紧密相连，使得成都平原的冬季不只是一个外部的存在，更是人物心理状态与社会现实的映射。小说的氛围从这一自然景象中得到深刻的暗示，为故事的发展提供了背景，也在无形中影响了读者对小说主题的感知，使得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既静谧又压抑的情感张力。

李劫人作品中的山川地貌及气候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特别是在《死水微澜》一书中，成都平原的宁静祥和与主人公内心的平静与安宁相呼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成都平原的自然景观，尤其是平静的冬水田与淡淡的阳光，象征着主人公生活的安定与内心的和谐。然而，当人物面临社会变革和个人命运的重大挑战时，小说中的地理环境——山区的险峻和艰难——则成为人物命运波折的象征。

在《死水微澜》中，李劫人通过对四川山区风雨交加、电闪雷鸣景象的描绘，进一步深化了环境象征的功能。山地的险恶气候和剧烈的自然现象预示着社会即将发生的剧变，以及人物命运的深刻转折。在描写蔡大嫂面临是否跟随顾天成离开以获得更好生活保障、并解救丈夫蔡兴顺的抉择时，李劫人用以下表述，营造了一个充满象征意味的情境：“他们第七次会面，依然在堂屋门前檐阶上，那天有点太阳影子，比平日暖和。”（李劫人，2017：260）[6]这一描写表面上似乎呈现出温暖的阳光，但与蔡大嫂内心的复杂情感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与无奈——一方面，她担心丈夫的命运，另一方面，她又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和恐惧。这种内心的撕扯与徘徊，正是社会动荡与家庭困境的写照。

2.2 “大河小说”中的巴蜀民俗风情

在文学创作的过程中，民俗文化的描写以生动而艺术的方式呈现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质，彰显了社会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李劫人的“大河小说”再现了其特殊的地形、文化等因素孕育的独特民俗风情，展现了这一地区特有的文化景观。

首先是对传统节日习俗的描绘，翔实且生动，通过对节日氛围的营造、祭祀礼仪的呈现等，展现了巴蜀地区独特的文化风貌，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生活状态和人们的心理世界。

尽管春节社会动荡不安，小说仍描绘了巴蜀人民在春节期间的欢乐与热闹：“不过新年当中，大家都过得很快活。”（李劫人，2017：155）[6]除了全国普遍的贴春联、挂彩灯和燃放鞭炮等习俗外，巴蜀地区独有的春节民俗也在小说中得到呈现。例如，一些家庭会在春节期间举行特殊的祭祀仪式，向祖先祈求来年的平安和幸福。同时，春节期间的娱乐活动，如划拳赌饮、看花灯、放龙灯等，在巴蜀地区尤为盛行，展现了巴蜀人民热爱生活、追求快乐的精神风貌。

中秋节在小说中被赋予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和情感色彩。尽管辛亥年间社会动荡不安，甚至有攻城谣言，但巴蜀人民依然如期举行夜宴，享受节日的欢乐。赏月、食月饼、备香蜡纸帛等传统习俗仍旧保留，这种对传统节日的坚守和尊重，体现了巴蜀人民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和认同。

清明节的描写更显神秘和庄重。在清明节，巴蜀地区的人们认为亡灵在阴间也需要生活，因此撕纸钱、封袱子、写袱子、烧袱子等祭祀程序成为重要环节。黄公馆（《死水微澜》中）的祭祀场景中，主人带领家人一丝不苟地进行这些祭祀活动，体现了对祖先和亡魂的敬仰和怀念之情，也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封建迷信思想。“清明节那天，天还麻麻亮，黄公馆里就忙开了。”（李劫人，2017：184）[6]这一细节描写表现了人们对祭祀活动的虔诚与重视。

中元节的祭祀形式更显精心与诚意。小说中提到“惟有烧袱子，又是成都极普遍的一种麻烦事，先把钱纸撕散，然后数出一定的数目，然后才用白纸封成包袱，包袱上面又须写明某姓祖若宗某某收用，后嗣某某焚化。”（李劫人，2011：262）[7]人们不用撕开来就烧的散钱纸而使用精心制作的“袱子”以表达心意。这种仪式感的细节描写体现了巴蜀人民的民俗信仰与对祖先的敬重。

小说还涉及了上元节、天回镇赶场与青羊宫庙会等节日民俗。在上元节，东大街的牌坊灯、风火墙、太平缸、花灯火炮等共同构成了热闹的夜市景象，人们不仅可以欣赏美丽的灯火，还能参与丰富的娱乐活动。天回镇赶场则是巴蜀地区重要的集市活动，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集市上商品丰富，有新鲜农产品、手工艺品以及各类小吃，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青羊宫庙会则更为热闹，宗教仪式、民间艺术表演与各类摊位交织，商品琳琅满目。

李劫人对川剧的描写具有独特的艺术表现力。小说中提到的戏园，如东玉龙街的清音戏园等场所，观众熙熙攘攘，各色人等混杂其中。帷幕尚未拉开，观众便迫不及待地期待演出，他们希望能从戏曲中看到

对保路运动的支持和鼓舞，以及反映民众心声的情节。

戏园作为社会娱乐的重要场所，其繁荣程度往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川剧内容与表演形式也与当时社会密不可分。李劫人提及了诸多经典剧目，例如“杨素兰的《大劈棺》，刘文玉与周名超的《柴市节》，李翠香的《三巧挂画》，邓少怀与康子林的《放裴》，蒋润堂的《飞龙寺》，还有游泽芳的《痴儿配》，小群芳的《花仙剑》，这才是高尚娱乐啊，好不安逸！”等（李劫人，2024）[8]。这些剧目不仅展现了川剧在四川地区的受欢迎程度，也突显了川剧作为地域文化代表的重要地位。

舞台上的布置似乎象征着升平世界，但一旦转向戏园外的社会，便是截然不同的景象。戏园内热闹非凡，而戏园外却动荡不安。这种对比凸显了时代的风谲云诡，为小说的发展和主题的表达奠定了历史文化基础，反映出辛亥革命前后四川社会的复杂局势。

2.3 “大河小说”中的重大历史事件

鲁迅先生曾言：“即以前清末年而论，大事件不可谓不多了：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无需戊戌政变，义和拳变，八国联军，以至民元革命。然而我们没有一部像样的历史的著作，更不必说文学作品了。”（鲁迅，2005：295）[9]但在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中，历史事件不仅是叙事的背景，更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力量，尤其是对保路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的描绘，展示了晚清至辛亥革命时期成都乃至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

“李劫人亲历并深刻感受过保路运动，这一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导火索之一。”（张中良，2023：125）[10]李劫人将这一历史事件有机融入小说中，生动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变革与人民思想的觉醒。郭沫若曾称李劫人的小说为“小说的近代史”，并认为它至少是“小说的近代《华阳国志》”，称李劫人创作的作品具有巨大的历史和文学价值。（郭沫若，1937：2）[2]

保路运动发生于清末，是四川人民为反对清政府将川汉铁路修筑权出卖给帝国主义而掀起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场运动不仅仅是一场经济斗争，更是关乎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政治斗争，直接引发了辛亥革命的爆发，深刻影响了巴蜀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大波》中，李劫人详细描绘了保路运动的多个历史节点，包括同志军的起义[7]、制台衙门血案[7]、龙泉驿兵变[11]、重庆反正[11]等。“这些运动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就是当时参加这运动的人，也

往往蔽于它那光怪陆离的外貌，而不容易说明它的本质。”（李劫人，1980：5）[12]“只有用文学作品才能有血有肉的、极尽纤微的、把它极其难测度的所表现出的外貌与隐伏着的错综复杂的内蕴形象化地反映出来。”（张秀熟，1980：4）[13]而李劫人也恰恰做到了这一点。

这些事件反映了四川人民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反抗清政府腐化无能的勇气与决心，也揭示了清政府的腐败与无能。李劫人通过人物塑造表现了人民的爱国情怀和他们在历史变革中的牺牲精神。例如，《大波》中的人物楚用，原本是一个有着自己学业与生活追求的年轻学生，但在保路运动的浪潮中，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个人利益，积极投身于争取铁路权益的斗争中。楚用通过参与集会和演讲，积极宣传保路运动的重要性，展现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他的身影象征着巴蜀人民为民族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安危的精神。

《暴风雨前》中的人物郝又三，出生于半官半绅的家庭，本有着较为优越的生活条件。但在新思潮的影响下，他逐渐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巨大危机。郝又三在高等学堂就读期间，开始接触革命派刊物《民报》和《国粹学报》而这正是他觉醒的起点。“郝又三虽没有革命的意识，但见解却渐渐宽广了。”（李劫人，2011：62）[14]在保路运动中，他决心摒弃传统家庭背景和旧有观念，积极参与其中，推动社会进步。郝又三的觉醒代表了当时知识分子群体在国家危机面前的觉悟与反思，反映了新文化与新思想在社会各阶层的传播。

同样，《大波》中的军界人物吴凤梧，普通市民傅隆盛，激进分子彭家琪等，也从不同的社会阶层出发，积极投入到社会变革的浪潮中。他们身处不同背景，但无一例外地展示了进步的行动和思想，成为推动当时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吴凤梧等人深知，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战胜外来侵略与内忧，保护家园。他们的无畏行动与理想主义精神，体现了巴蜀人民在动荡时代中坚守民族尊严和国家利益的决心。

李劫人通过再现保路运动等历史事件，展示了巴蜀人民在国家危机面前展现出的牺牲精神与爱国情怀。在这些历史事件的推动下，巴蜀人民表现出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责任感。这种精神构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部分，也成为李劫人小说中不可或缺的主题之一。在塑造小说人物的过程中，李劫人揭示了个人与国家、传统与进步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突显了巴蜀人民在重大历史关头所展现的使命与担当。

2.4 “大河小说”中巴蜀品格的构建

“巴蜀文化比起中原文化而言，它应该属于泛儒家文化的边缘地区，作为古代的边鄙之地，它有许多地方都是冲破儒家礼俗规矩的。”（谢应光，王方，2015：206-217）[15]在李劫人的“大河小说”中，巴蜀地区的地域品格因历史事件得以展现，更因社会环境、个人成长经历以及价值观的冲突和转变逐步构建。四川盆地的封闭性，以及传统礼教的深刻影响，塑造了巴蜀人民特有的性格特征，其中既包含坚韧顽强的传统品格，也体现了在社会变革和思想冲突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蔡大嫂代表了巴蜀女性形象与巴蜀品格的现代转型，是对巴蜀地区女性形象的重新塑造，也是对巴蜀品格的深刻阐释。蔡大嫂聪明、美丽，且具备独立的见解；她外貌出众，且善于察言观色，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她的性格刚烈泼辣，不畏世俗眼光，勇敢追求幸福和自由，敢于挑战传统观念和道德规范。蔡大嫂的复杂性格，展示了她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对自由和幸福的渴望，折射出巴蜀女性对新思想的渴望与追求。然而，蔡大嫂的内心世界并非单一的叛逆与追求，她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也深受社会舆论和传统道德的束缚。这种复杂的内在需求使她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和真实。正如谭梅（2014：148）所言：“巴蜀社会由古代向现代过渡的过程中，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角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的伦理道德与性别关系的重构，使得女性在社会中逐渐获得了更多自主权。”[16]蔡大嫂的叛逆行为，尽管在传统伦理中被视为“越轨”，却代表了巴蜀女性对新社会价值观的回应与挑战。

罗歪嘴与顾天成则是男性形象与巴蜀传统文化交织的典型。李劫人所描绘的男性人物也深刻反映了巴蜀文化中的矛盾与复杂性，尤以罗歪嘴（罗德生）和顾天成为代表。作为袍哥组织的头目，罗歪嘴既展现了传统男性的豪爽与义气，又表现出与之相矛盾的恶势力色彩。他为朋友两肋插刀，讲义气、重情义，深受巴蜀江湖文化的影响，但同时也沉溺于吃喝嫖赌，充满了传统封建社会的负面特质。李劫人通过对这一矛盾的塑造，展现了巴蜀男性人物在传统文化与现代价值观的夹缝中挣扎的复杂性。顾天成这一角色则进一步揭示了巴蜀社会中传统家庭伦理的局限性和以及新思想对其造成的冲击。顾天成作为纨绔子弟，性格好色、懦弱且缺乏心机，他在与罗歪嘴的矛盾中表现出强烈的报复心理，也使用了不计后果的手段。在他的身上，李劫人描绘了巴蜀男性传统观念中的软弱与懒散，同时也映射出社会变革过程中出现的价值观错

乱和个体理想的迷失。

蔡兴顺是懦弱与传统守旧观念的结合体。他性格老实本分，缺乏社交技巧，不善言辞。他经营着一家杂货铺，过着平凡且简单的生活。然而，在面对妻子蔡大嫂与罗歪嘴之间的情感纠葛时，蔡兴顺却表现出令人失望的懦弱态度。“不料他竟毫无反响地容纳了，并且向罗歪嘴表示，如其嫌他在中间不方便，他愿意简直彰明较著地把老婆嫁给他，只要邓家答应。”（李劫人，2017：155）[6]在这一情节中，蔡兴顺的无能与忍气吞声被展现得淋漓尽致，他选择默默承受妻子与他人纠葛所带来的屈辱与伤痛，未曾反抗或提出异议。

蔡兴顺的懦弱和无力，决定了他在家庭中的被动地位。在面对妻子蔡大嫂的叛逆与追求自由时，他无法理解她的行为，且深感不满。蔡大嫂勇敢反抗传统束缚，追求个人自由与幸福，而蔡兴顺则依然固守传统观念，无法接受妻子的独立和自我追求。这种思想上的隔阂，使得他与蔡大嫂的关系日渐疏远，最终走向无法调和的地步。蔡兴顺的传统守旧性格，揭示了当时社会中保守与变革、个人与家庭之间的激烈冲突，反映了他作为一个传统男性在现代化浪潮中的无力与挣扎。

李劫人所描绘的巴蜀人物，既是历史变革的见证者，也是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塑造者。他们的人格与行为不仅反映了巴蜀地区历史、文化与社会背景的独特性，也折射出社会进步和思想解放的复杂过程。李劫人在小说中揭示了巴蜀人民在现代化浪潮中的个体选择与价值冲突，使这些人物不仅具备历史意义，也在情感和心理层面与读者产生共鸣。

总的来说，李劫人在“大河小说”中通过复杂而立体的的人物塑造，生动展现了巴蜀地域品格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这些人物不仅是巴蜀社会变革的产物，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思想冲突与融合的象征，呈现了一个充满活力和变化的巴蜀社会。

3 结语

李劫人的“大河小说”是巴蜀地域文化的生动写照，更是这一地区历史、风土人情与文化精神的深刻体现。本文通过对李劫人作品中的巴蜀自然景观、民俗风情、重大历史事件及巴蜀品格构建的分析，揭示了自然景观与人物命运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自然景象不仅是背景的再现，还是人物情感与命运交织的象征载体。巴蜀的民俗风情在动荡的社会中带来一丝温情与希望。历史事件的描绘则突显了巴蜀地区命运的变迁与

转折；而巴蜀品格的塑造，展现了巴蜀人民在历史长河中所体现出的坚韧与勇敢。作品中蕴含的巴蜀地域文化记忆，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也为理解巴蜀文化的独特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展望未来，随着更多学者对李劫人“大河小说”中巴蜀地域文化记忆的深入挖掘，期待这些作品能够跨越国界，走向国际舞台，进一步推动巴蜀文化的传播与创新发展。在新时代背景下，李劫人作品中的巴蜀文化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贵财富，也具有全球意义，有望成为促进全球文化交流与理解的重要桥梁，并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包中华. 李劫人与中国现代文学 [D]. 南京师范大学, 2016: 94.

[2] 郭沫若. 郭沫若佚文集 [J], 中国文艺, 1937, (01): 5-6.

[3] Kristin STAPLETON. The lost geopoetic horizon of Li Jieren: the crisis of writing Chengdu in revolutionary China. By Kenny Kwok-kwan Ng [J]. 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 in Chinese, 2016, Vol. 13(1). 49.

[4] 李怡. 现代四川文学的巴蜀文化阐释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5: 2.

[5] 李劫人研究学会. 李劫人研究 [M].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6: 7-8.

[6] 李劫人. 死水微澜 [M].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

[7] 李劫人. 李劫人全集(第3卷) 大波 上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8] 李劫人. 大波 上 [M]. 济南: 泰山出版社, 2024.

[9] 鲁迅. 鲁迅全集 (第2卷) [M].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354.

[10] 张中良. 从历史认知功能审视现代长篇小说的价值 [J]. 天津社会科学, 2023, 5(5): 124-129.

[11] 李劫人. 李劫人全集(第3卷) 大波 下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12] 李劫人. 《李劫人选集》(第1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13] 张秀熟. 《李劫人选集》(第1卷),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0: 4.

[14] 李劫人. 李劫人全集 (第2卷) 暴风雨前 [M]. 成都: 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1.

[15] 谢应光, 王方. 李劫人“大河小说”影响力初探 [J]. 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 2015, (2): 206-217.

[16] 谭梅. 巴蜀妇女文化的现代化. [J] 中华文化论坛 2014, 12(12): 148-154.